

一、呼唤近代思想风雷的龚自珍

1839年4月23日傍晚，一位广额嶮颐的官员，不携家眷随从，一车自载，一车载着文集百卷，走出了残破古老的北京城，离开了笼罩在夕阳昏光中的清王朝统治中心。

此公坐在车上，忧心忡忡，流露出既愤慨又无奈的苍凉心情。他所忧心和愤慨的不仅仅是自己蹉跎的仕途：38岁考中进士，却被冷置于内阁中书这一小官达十七八年之久，如今不得已辞官南归；更为忧心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此时已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夕，外国侵略者虎视眈眈，罪恶的鸦片贸易不仅使大量白银外流，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而且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鬼灯队队散秋萤，落魄参军泪眼荧”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腐败的清统治者却依然沉醉在天朝帝国和太平盛世的幻觉中，这怎能不令人忧心和愤慨呢？尽管如此，此公的眉宇间仍充满着一股难以遮掩的凌人傲气。随着小车在弯曲、荒凉的古道上颠簸，他不时发出慷慨长吟：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位慷慨歌者，就是呼唤中国近代思想风雷的思想家、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字璦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其祖父龚敬身，乾隆己卯举人，官至吏部右侍郎，著有《桂隐山房遗稿》等。父龚丽正，嘉庆元年进士，曾任江南苏松

太兵备道 署江苏按察使 著有《三礼图考》、《国语补注》等。母段驯 著名汉学家段玉裁的女儿 亦工亦诗 著有《绿华吟树诗草》。龚自珍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累代仕官簪纓、三代居京官的家庭里。龚自珍少年聪明慧莹，7岁随父母习文诵诗，12岁随外祖父段玉裁学习许慎《说文》部目 由文字学入手 开始研究经学。家学渊源、名师指导 似乎规定了龚自珍的前程是 或踱步于仕途或爬梳于经籍。然而从小随父入京 寓居官衙 后又随父迁升调任 往来于河北、安徽、浙江、江苏等地 接触到包括“田夫、野老、駉卒”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由此对统治者的昏庸和残暴、贫民百姓的饥寒交迫、国家的衰败以及外国侵略者窥觐中国领土的野心有比较深刻的体验，再加上自身在仕途中遭受的挫折，点燃了他的社会批判意识。

龚自珍生于嘉庆、道光年间。从表面上看，“康乾盛世”的余辉仍在耀人眼目 封建统治者也极为粉饰太平 在歌舞升平里麻木不仁。龚自珍则以诗人敏感的悟性和思想家深邃的目光 洞察到在虚幻的盛世背后的衰世真相 并预言乱世随之而来。这表现在他于1813—1817年连续撰写的《明良论》、《尊隐》、《乙丙之际箴议》、《平均篇》等论文中。

他明确指出 当时的社会已经是“痹痿之疾 殆于痼疽 将萎之华 惨于槁木”的“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这种“衰世”在政治上表现为社会机体内部腐烂发臭。陈陈相因的封建专制制度、旧礼教像一根巨大的绳索、迫人“卧之以独木”，俾四肢不可以屈伸”不仅从肉体上对人进行束缚 而且从精神上“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在这种残暴的专制统治下 到了“左无才相 右无才史 闾无才工 庠序无才士 阡陌上无才民”甚至“苍无才偷 市无才狙 藪泽无才盗”的地步，一派死气沉沉的景

象。与此相联系，专制君主视臣下如犬马，“朝见长跪，夕见长跪”；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崇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造成了“政要之官”只知讲究车马服饰，谄媚求宠，追求声色享乐；“清闲之官”只知作诗、和诗，闲谈琴棋书画，纵酒逍遥；“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保职安荣，苟且偷生。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整个统治集团麻木不仁，失去了任何反应能力。针对此，龚自珍在《尊隐》中以寓言形式，通过腐朽统治者所在的“京师”和新生力量所在的“山中”的对比，指出“京师之气泄，则府于野”；“京师之日苦短，山中之日长”；“京师”是行将崩溃的“鼠壤”，“山中”则“壁垒坚”。“京师朝贵，寡助失亲”，“山中之民则”一啸百吟”。这不仅是对最高统治者提出了严厉的警告，而且表达了他希望有一种新的来自下层的社会力量的崛起，发生震聋发聩的呐喊。

龚自珍还从经济方面分析了社会衰亡的根本原因，认为清王朝自乾隆以来，土地高度集中，贫富两极分化，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官吏士民、狼奸狈麀，不土、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给社会的安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如果这种状况任其发展下去，“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因此，必须打破现状，实行改革。他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这是中国近代呼唤变法改革的第一声。

作为近代思想的前驱者，龚自珍在 1823—1826 年连续写成了《壬癸之际胎观》、《尊史》、《古史钩沉》等论文，系统阐发了为其变法改制服务的哲学思想。这意味着他不仅以社会批判理论，鼓动人们冲破旧时代的束缚，而且在其哲学思想上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的端倪，成为近代思想的发轫。

中国古代虽有“以史为鉴”的传统，然而重视历史规律的探索则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显著特点，因为近代思想家们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必须把握古往今来的历史演变规律。中国近代思想的这一显著特点，是从龚自珍发端的。他接受了传统的“公羊三世”说，但并不囿于它，而是对它作出新的解释，使之为其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服务。他认为，不仅春秋分为三世，“通古今可以为三世”；“一日亦用之，一岁亦用之”；“每天、每年、每个时代，整个社会都是按‘三世’循环演进的。甚至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都可以概括为‘初、中、终’三个发展阶段。”“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始”；“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这里虽然还没有跳出传统的循环论的樊篱，但是把变法改革与历史规律的探求联系起来，却表现了近代中国的时代特点。因而龚自珍的“公羊三世”说有了不同于传统的时代意义。

龚自珍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并非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从中把握现实社会发展的“大道”。由此出发，他继承了浙东学派“六经皆器”的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指出：“道载乎器，礼征乎数”，强调不能离开具体的事物去讲求空虚的道。要从具体历史事实的考察中，洞察历史的规律，来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因而他提出了“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的著名论点，强调学术应该为现实服务，冲击了空谈心性的宋学和拘泥于名物训诂的汉学，标志着近代学风的转变。

中国近代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突出“自我”的个性解放，这也是以龚自珍为开端的。针对封建专制扼杀众人之真心，和正统儒家宣扬“天命论”泯灭人的个性。龚自珍明确提出了“众人之宰，自名曰我”的命题，标志着“自我”的觉醒，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相类似，是中国近代人文

主义的起点。他认为人类历史并不是什么代表“天命”的圣人所创造，而是“众人自造”，这个“众人”不是别的，而是“觉醒”了的“我”，即个人的主观精神，宇宙万物都是“我”，这是主观精神创造的。尽管他的这一命题是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但他把“自我”作为世界的第一原理，在中国思想史上如此明确地提出来，使他的思想具有强烈个性解放的色彩，对近代改良派和革命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像其他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一样，龚自珍也不为当时日趋腐朽的统治者所容，他一生坎坷，受尽磨难，不得已于 1839 年 47 岁时辞官南归，就任江苏丹阳县云阳书院讲席之职。在他辞官后的第三年初，即 1841 年 8 月 20 日，因暴疾卒于丹阳，终年 49 岁。

这时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刚把中国轰入了近代的门槛，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龚自珍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思想家。然而，由于他思想的批判性和对近代人文主义精神的呼唤，使其成为近代思想的先驱者。

龚自珍不仅是封建“衰世”里的一位清醒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造诣很高的爱国诗人。作为诗人思想家，他的思想有着对时代气息强烈的感悟力；作为思想家的诗人，他的诗作又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而绝少无病呻吟之作。他一生写了大量的优秀诗作，现存的 600 多首传世之作与他的其他著作一起被后人编为《龚自珍全集》（1975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放眼看世界的率先者魏源

1842 年 8 月 29 日 南京下关江面一带 阴霾四起 山雨

欲来。停泊在这里的英国军舰“汗华丽”号上正在签订给中华民族带来长久耻辱、影响着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历时两年多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结束。然而，战争隆隆炮声留下來的震撼远没有结束。

面对这场失败的战争，面对破碎的山河，面对这一屈辱的条约和接踵而来的列强咄咄逼人的气焰，有的人麻木不仁，仍然沉醉在“泱泱大国”的千秋美梦中；有的人则由战前的颀颀自大、愚昧无知一变为奴颜婢膝、俯首贴耳，表露出各不相同的心态。此时，一个时代的最强音响起“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发出这声时代呐喊的人就是与龚自珍齐名，时称“龚魏”的又一近代思想先驱——魏源。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潭（今隆回金潭）人。魏源从小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喜独坐沉思，“默深”之字就可能缘由此来。魏源7岁入家塾，勤奋好学，虽严寒酷暑，手不释卷，夜手一编，攻读达旦。据传有一次，其师因50余日不见其面，以为他病了，前去看望，只见他满面尘垢，鬓发如蓬，埋首书中。1808年，15岁的魏源考取秀才，研习王阳明的学说。17岁便在家乡设馆授课，颇有名气。1816年，魏源随父入京。沿途所见，满目疮痍。清王朝衰败的情景深深地烙在他的心里。进京后，与龚自珍相识，成莫逆交。29岁中顺天府乡试举人，随后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邀为幕僚，并参加编写《皇朝经世文编》。然而，他在中举后屡试不第，只得在38岁时花钱捐了个内阁中书舍人候补。内阁丰富的藏书，使他有更多地阅览文史典籍。不久，因父病逝，回家居丧。守孝期满，受两江总督陶澍之邀为幕僚，正值林则徐任江苏布政使（后升任江苏巡抚），在此期间，魏源协助陶、林筹划漕运、进行盐政及水

利改革，提出不少兴利除弊的举措。

不过，这时的魏源对于社会弊病的医治，和龚自珍相似，是“药方只贩古时丹”。鸦片战争之后，魏源的思想开阔了，开辟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方向。

这一新的思想方向，是以对西方国家的了解为基础的。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基本上囿于“夷夏”观念之中，根本不知道西方国家的地理位置和其它情况，直至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时，开始在官署中设译员，购置西方文书报加以翻译，并主持翻译了《四洲志》等介绍西方情况的资料。战后，魏源受林则徐之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50卷（1852年扩编为100卷），这是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客观地介绍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历史、地理和政情的著作，是近代中国率先放眼世界的著作。尽管在书中，魏源也沿用了习惯用法，称西方为“夷”，但却没有轻漫、歧视外国人的心理，而是把洋人称为“奇士”、“良友”。针对顽固派把西方的机器、轮船称为“奇技淫巧”，魏源指出只要是“有用之物”，对国家人民有利，“即奇技而非淫巧”。

魏源的卓越之处不仅在于提出了客观地了解、学习西方，而且在于具体指明了应该学习的方面和相应的措施：设翻译馆，译西书，培养通晓外事的人才；在广州设造船厂、火器制造局，制造轮船、枪炮，改造绿营和水师，裁减冗员，淘汰老弱闲散无用之兵；提高士兵待遇，学习西方选兵、养兵、练兵方法等。同时，魏源认为，学习外国的长技并不仅仅局限于“船坚炮利”等军事技术，而且要学习其它如“量天尺”、“龙尾车”、“千里镜”等有益于“民用者”的实用技术，并主张允许商民办厂设局，发展民间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他在了解、介绍西方情况时，已逐步觉察到西方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并对美国的民主

选举大为赞赏。

现在看来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西方的了解和介绍是很肤浅的，但他在当时主张向西方学习 改革弊政 要求发展民间资本主义 符合和代表了时代的进步要求。在过了二三十年之后，他的这些思想才成为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的实际行动 并成为戊戌变法的思想先导 表现出一个杰出思想家的远见。特别是他在当时清政府日益没落 又遭外来侵略 中国社会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 强调只要下决心向西方学习 就能“风气日开 智慧日出” 挽救民族危亡 赶上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对于鼓舞民族精神 增强民族自信心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魏源作为近代思想的先驱，立足于当时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立场，考察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特别强调“变”的重要性。他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 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并且认为“变古愈尽 便民愈甚”这里的“便民”就是有利于民众 符合民众的要求 从而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 推动社会发展 朦胧意识到民众的力量和作用。同时 魏源也特别强调发挥个体意志的力量 认为只要“造化自我” 发挥个体意志的作用 就能“造命胜天” 推动历史进步。魏源“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历史观虽然还没有能够超越传统的“器变道不变”的局限 但已包含了某些历史进化观点的萌芽。特别是他把“便民”与历史发展趋势相结合 从历史发展趋势和“造化自我” 发挥个体意志作用两个方面考察历史发展的动力 既强调民众的作用 又强调个体的作用 既看到了必然性 又看到主观能动性，表现出理论的灼见。

魏源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经学学风对人思想的束缚，

明确提出了“违寐而之觉 革虚而之实”的具有近代意义的认识论命题 要求人们由蒙昧而觉悟 由空谈而切实。这不仅是 中国近代政治改革的要求，而且体现了中国近代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方向 启发蒙昧 面对现实 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正是循着这一方向 魏源在认识论上还提出了“及之而后知 履之而后艰 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认为只有通过亲身的经验 接触实际的事物 才能获得真切的知识。尤其表现出新时代特点的 是他在知识才能的来源问题上 提出了“才生于情”和“学资于问”。认为只有对国家和人民怀有热情 忧国忧民 才能成为济世之才 只有善于向众人学习 广泛听取众人的意见 才能得到真正的学问 决不能以自己独得的一孔之见 而沾沾自喜。这一“才生于情”和“学资于问”的思想 散发出近代人文主义的气息。

1845 年 52 岁的魏源考中殿试第三甲 赐同进士出身 出任东台知县。正像他自己所说：“中年老女 重作新妇 世事逼人至此 奈何？”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1850 年调任海州分司 运判，次年迁高邮知州。1853 年因“迟误驿报”被革职。后虽经 钦差大臣周天爵保奏官复原职，但年过 60 的魏源以“世乱多故 无心仕官”为由辞谢 将全家迁至兴化 从此潜心著书 手订平生著述 思想也渐入消沉 喜好佛教 在兴化西寺“终日默坐参禅”。1856 年秋游杭州 住东园小庵。次年 3 月病歿于杭州。

魏源的著作 除《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外 大多编入《魏源集》（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三、追求地上“天国”新理想的洪仁玕

龚自珍所预感的‘山中之民’呼啸而起的‘大音声’在 30 多年后变成了现实。1851 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金田村爆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农民战争，它们要建立的地上‘天国’和以往农民起义的理想社会基本上是相同的。然而它在后期颁布的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则具有突破传统农民战争的近代思想萌芽，使它的地上‘天国’取得了新的理想社会的方向。《资政新篇》的制定者，是太平天国后期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

洪仁玕(1822—1864)字益谦，号吉甫。祖籍广东潮州，后定居广东花县，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族弟。1843 年夏，参与创立“拜上帝会”。金田起义后，他三次追寻太平军均未成功。自 1852 年春至 1858 年秋，他逗留上海、香港等地。在这期间，他不仅研读自幼熟悉的中国古代典籍，而且学习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也研究了基督教教义。1859 年 4 月，当他经过数月长途跋涉，抵达天京时，虽然江南田野在明媚的春光里显示出一派生机，然而太平天国革命却正陷于困境之中：一方面西方列强撕下了“中立”的伪装，公开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面经过“杨韦事件”之后，太平天国本身的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因此，对于洪仁玕的到来，洪秀全喜出望外，很快就委他以重任。洪仁玕受命于危难之际，为使太平天国能“生色图强”，向洪秀全提出了革故鼎新的纲领《资政新篇》。

这个纲领性文件，既表现了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继承，

又萌发出与以往农民所向往的地上“天国”有所不同的新理想。这种新理想的价值在于，给农民革命提示了一条在近代条件下，摆脱封建羁绊，突破农业小生产狭隘眼界的道路。这一新理想具体表现在：

政治上，主张加强法制，“设法、用人”要“得其当”，立法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了解国内外情况，并通过宣传教化，“恩威并济”，宽猛相宜的方法来贯彻已制定的法规，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为了克服太平天国后期“用人察失类”所造成的“人心冷淡”、政令不行的分散主义倾向，洪仁玕还提出了“禁朋党之弊”，反对结党营私，以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他主张在太平天国政权下“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设书信馆”；以为四方耳目之便，不致上下使塞，君民不通”，显露出建立近代民主制度的意识。

经济上，洪仁玕主张承认财产私有制，大力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近代交通事业，造火车、轮船，修建公路，整理街道；发展近代工矿业，开采矿业，兴宝藏，准许民间“探取”、“采获”，发展近代水利事业。由国家支助或民间自助兴办水利，疏通江河水道，发展近代工艺技术，鼓励私人发明创造，实行专利制度，发展近代金融事业，准“富民”设立银行，发行“银纸”（纸币），改进税制，“兴市镇公司”，征收工商水陆关税；等等。

社会文化事业上，洪仁玕主张设“士民公会”，兴办教育，奖励民间开办“学馆”，破除封建迷信，革除不良社会习俗如“修斋建醮”、阴阳风水、妇女缠足等，并将修建寺院道观的捐助和没收庙宇寺观的财产用于兴办“学馆”和医院。洪仁玕还主张大力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以“拯困扶危”。开办育婴堂、设“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实行社会保险法等。

外交上 洪仁玕认为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技艺精巧 国法宏深”，因此应该向西方学习，允许外国商人来华进行正常贸易、通商。并准许牧师、教技艺之人进入内地教导我民；准其为国献策”等。特别是他提出了“与番人并雄之法”主张与外国商人展开竞争，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反对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 表现了其思想的远见。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这些具有近代意义的主张，和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张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前者建立在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而后者则是维护和保持这个土地所有制的。这表明太平天国已不同于过去的农民起义 它不仅打击封建制度 而且具有某些资本主义色彩。因此，尽管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资政新篇》缺乏实行的条件 但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

洪仁玕对于地上“天国”的新理想的追求 是以他的包裹在基督教神学外衣下的革命世界观为指导的。他在《英杰归真》中指出 世界是一个不断地除旧更新的运动过程“云净而月明 春来而山丽 衣必洗而垢去 物必改而更新 理之自然者也”“人也要不断地改过自新“，力求自新 转以新民”；相与淑身淑世”，即通过共同努力来改善自身、改造世界；通过这种“相与淑身淑世 相与正己正人”的活动 人类就能实现“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美好社会。这里包含着理想社会在未来，要依靠群众斗争来实现的观念，而中国传统观念以为理想社会在尧舜三代，是要仰仗圣人的教化才能恢复的。因此，在洪仁玕的神学说教中潜藏着不同于传统的旧世界观的新思想。太平天国革命只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刚刚揭开的序幕，洪仁玕的包含着革命世界观的新萌芽在那时还处于自发的状态。以后随着民主革命运动的逐步深入，这种革命的世界观就

渐渐地取得了科学的形态，由自发发展到了自觉。

正因为洪仁玕的革命世界观是与神学纠缠在一起的，所以他所追求的地上“天国”的新理想就具有信仰“基督救世主”的迷信色彩。同时，他的新理想也未能完全跳出正统儒学的皇权主义的巢穴。他说：“孔丘作《春秋》首正名分大书直书曰天王盖谓王系于天所以大一统也。”这就给他的新理想蒙上“天子受命于天”的陈旧灰尘。

太平天国革命在持续了 13 年之后，失败了。1864 年 7 月，天京陷落。洪仁玕护送幼天王至江西。同年 11 月 7 日在江西被清军俘获，于 11 月 23 日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仅 42 岁。

洪仁玕不仅是个坚贞不屈的农民革命英雄，而且也在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

洪仁玕的主要著作除《资政新篇》外还有《英杰归真》等。今人编有《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 1978 年版）。

四、忠实的末世迂儒——倭仁

在晚清的政界和士大夫群里，有一位严格的理学律己律人的人物 曾国藩曾尊他为“良友”发誓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起向他学习，“每日一念一事 皆写之手册 以便触目克治。”

这位令曾国藩肃然起敬的人便是倭仁（？—1870）。字良斋 谥文端 蒙古正红旗人。世代驻防河南 道光九年进士。著有《正谊堂集》辑有《古今帝王事迹》、《名臣章流》（合称《启心金鉴》），他一生官运亨通 位居大学士 晚年还当上了同治帝

的师傅。死后被赐予太保衔。如此高官显赫 不在于他有治理国家的文韬武略，而主要在于他固守和践履理学的品行及其渊博学问。

倭仁长期蛰居京城 敢于进谏。面对国家的“吏治日坏”、“辅弼乏人”、“民穷财尽”内外纷扰的现实 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给咸丰帝的奏疏中 他认为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积重难返”或“人才萎靡”而在于上层统治者“志不期于远大 政以苟且而自安。意不极于纯诚 事以虚浮而鲜效”。这实际上是批评统治者尤其是皇帝没有高远的政治志向，没有尽心致力于国家的治理。他从理学“正心诚意”的观点出发 主张“转移一世之人心”由上而下励精图治。他说：“欲济当今之极弊而转移一世之人心 亦在朝廷而已矣”。何以转移人心 以达于“治平天下”的目的 这有一个由心及物、由内向外的过程。首先 最高统治者应有“承艰巨之任”、“困心横虑以换颓世的雄心壮志 即立定坚卓有为之志 其次 统治者要“切劘身心”、“穷理修身”以行仁政崇节俭。这种主张显然是沿袭了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尽管他不怕惹皇帝“雷霆之怒”而犯颜直谏的品格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 传统的儒家无法回答近代的历史课题，因而他凭借儒学来治国平天下的真诚愿望就表现为迂腐可笑。不过，倭仁的思想是有典型意义的。因为它展示了传统士大夫在顽强维护理学的心态。所以 倭仁的思想是值得认真剖析的，他的思想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 “穷理修身”——旨在立“为尧舜之志”、“内圣外王”。此志定“天下之治成”。因此 它是治平天下的根本所在。为人君者 应以古圣贤为榜样 克己、戒“傲”、戒“怠荒”、戒“逸欲” 以身作则。这是一条德治主义的政治路线 它不仅适用于君主 也是对其他大小官僚的要求。作为理学家 倭仁自己在

“穷理修身”上“用功最笃”。他认为“人心至危”因此要“修省密”、“惕厉深。”他每日有札记，反省自己的言论举止是否得当，饮食用度是否节俭合理，内心是否有私欲等等。使自己的外表整齐端重，内心纯洁宁静，均符合“礼”的要求。这种言行一致，诚恳笃实得到了同僚的敬重。如何桂珍说他“秉性忠贞，见理明法，处危疑而不惧，临利害而不摇。生平言行，一一不负所学。若授以艰巨，必能尽言竭力，死生以之”。这仅就其品格而言。以实际来看，他固守理学的“修身”结果是把自己“修”成了没有经世之才唯有效忠之心的“迂儒”。咸丰元年，皇帝赏倭仁以副都统衔，充任边疆叶尔羌邦办大臣，然而直到咸丰二年，他给皇帝的奏疏仍丝毫“未及边陲情形”所论的“治道”乃是“村子间老儒所能道者也”。这令咸丰帝十分失望。

2. “用人”——人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倭仁也认识到“行政莫先于用人”；若长无人之患，更甚于无财。”主张“兴贤育德，以储桢幹。”用人的主要标准是看一个人有无德行，他说：“朝廷用人，不拘一格。才如可任，自不妨舍短取长。惟以贪鄙之行，奢侈之性，而济之以巧诈之心，则其所谓才，不过欺饰，弥缝而已。”他并不否认才能的作用，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德行，假权济私，贪鄙巧诈，其才不可用。所以，“用人莫先于严辨君子小人。夫君子小人藏于心术者难知，发乎事迹者易见。”他的这种“严辨”论得到了道光帝“言甚切直”的赞许。倭仁所津津乐道的“君子”、“小人”并没有超过传统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窠臼。但在吏治混乱，民族面临危机和官僚贪污腐化的历史条件下，他提出用“君子”而非“小人”的观点，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他自己作为朝廷任用的官僚，自律甚严，俨然“君子”。倭仁生活“俭素”，与人交往“不通馈遗”。他的一位姻家，任广乐澄海县知县。他到京城拜谒倭仁时，赠千两白银给他，

倭仁坚决辞谢。倭仁对他说：“姻娅之间，本可以接受投赠。只是你正在此述职，而我恰好又是审查之人，因此我一分钱也不能收。你若执意不收回，我就采取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用你给的钱办一个粥厂，救济贫穷饥饿之人。”他的姻家既渐愧又感动，叹服着回去了。倭仁慎择慎荐人才，所以，他虽为当时很有名望的官僚和理学家，他的门生故吏却“恒寥寥”。他主张任用“君子”，也敢于揭露批判贪官污吏。新授任的广东巡抚黄赞汤任奉天学政时，却声名狼藉，同治元年7月入京，觐见皇帝时，又携带巨资广行馈送。倭仁上书皇帝，认为此人有“贪鄙之行，奢侈之性”，谓其有“斡济之略，恐不能也”。任黄为广东巡抚，“未见其可”。于是黄被免去广东巡抚一职。可见，在义与利之间，倭仁是重仁义的“君子”。不过，近代所呼唤的人格，不是拘束于传统道德的“君子”，而是敢于打破一切束缚的“豪杰”。

3. “理财”——统治者应节约理财，“去奢”、“去私”。这是倭仁的重要政治主张。同治年间，武英殿着火，倭仁便借“武英殿不戒于火”为题，敦请皇帝“勤修圣德，躬行节俭”，以消弥灾害。他认为自古以来，宫禁火灾都是因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所致，“人君苛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火从高起。武英殿火祸，正是由于‘此年以来，土木之未尽止息，天安神武门楼，均加修饰，宫廷之内，屡有兴作’之故。由之，他建议“将一岁度支出入之数，通盘筹画，自官府内外，大小衙门，凡可裁者，概行裁省，勿徇虚示，勿沿故套，而避嫌怨，勿畏繁难，务量入以为出，勿因出而轻入，……至着人情嗜利，廉耻道丧，宜杜言利之门”。他希望通过理财，来解决当时的财政困窘和抑制奢靡之风。这并非是无所见，但他没有看到近代中国的富强之路在于发展近代工商业。这是他落伍于同时代之先进者的地方。

清末社会的内忧外患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日益腐朽没落

的必然结果。在这种过程中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受到外来文明的挑战。在与西方文明的参照比较中，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显得落后和苍白无力。鸦片战争前后 龚自珍和魏源已隐约感到了时代对新精神的呼唤。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倭仁仍汲汲于维护满清的政治统治，固守理学并以理学来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 确实是十分迂腐的。他希望中国能抵御外侮 保持国家尊严 但自己却又无能为力，一筹莫展。1871 年天津教案起 曾国藩赴天津处理 他不惜一切与洋人媾和。倭仁因此对曾极为不满 写信表示“绝交”。曾国藩对倭仁的指责“引咎自责”但“未尝不笑其迂也”。在曾国藩看来 倭仁不识时务 对外国一无所知 所以他“迂”。但是 倭仁并不是虚伪的理学家，他是理学的忠实践履者。然而他越是忠实就越是显得迂腐。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理学及其所维持的封建制度已步入日暮途穷的末世的反映。

五、讲求洋务的理学名臣 —— 曾国藩

曾国藩服膺倭仁践履理学的人品，却对其迂腐不屑一顾。他所谓的“迂腐”就是指不懂得讲求“洋务”。因此 曾国藩虽然也像倭仁那样 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学传统 但在这一传统中增加了“洋务”的时代内容。因而有人把他的理学思想概括为“惟务躬行 兼尚实用”。

曾国藩(1809—1871) 字瀚生 号伯涵 谥文正 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进士。著有《求阙斋集》等。他由于创办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被清廷封侯加爵 成为“中兴名臣”。

对乾嘉以来的汉、宋学之争 曾国藩持调和的态度 认为